

1982年3月10日，湖南长沙县在修缮杨开慧烈士故居板仓杨家老屋时，从杨开慧卧室后墙的砖缝中，发现了杨开慧写给杨开明的一封未寄出去的托孤信。

杨开明是杨开慧的堂弟，时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

杨开慧的这封信是这样写的：“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

信中所说的孩子们的叔父，就是毛主席的二弟毛泽民。

能被嫂子如此信赖，是不容易的。

读关于毛泽民的史料时，常常让我泪湿双眼。

在
毛家
三兄弟中
，毛主席17岁就
离开家乡，三弟毛泽覃13岁时也前
往长沙读书。

只有二弟毛泽民在家乡韶山种地。他从十三四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务农，父亲去世后，他就靠种地的收入供养哥哥与弟弟读书。

毛主席后来曾回忆说：“我到长沙去读书，是泽民送我去的。他穿的是短褂，帮我挑着行李，外人看来，就像是我花钱雇的一个挑夫。他定期到长沙来，为我送米送钱。有一次，他送钱来晚了几天，我很不高兴，就责怪了他，他也不吭声。临回韶山前，他才告诉我，今年收成不好，为了把谷子卖个好价钱，他跑了好几百里路喔。他走后，我惭愧了好多天。没有泽民，我哪里能到长沙来读书啊。”

毛家三兄弟一生中只有唯一一张合影，是1919年春天三人同母亲在长沙照的。



印刷发行苏区统一货币是国家银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印刷纸币必须用坚韧耐磨的特殊纸张，这种纸张只能从白区进口，国民党对此严密封锁。毛泽民开始想办法自己造纸，他想起茶叶店包茶叶用的一种皮纸，又坚韧又耐磨，就向当地有造纸经验

的工人和群众做调查。得知这种纸是用附近山上一种老树皮做原料的，他就立即组织人员上山采集树皮。

从白区购买油墨也很困难，毛泽民去请教吉安城“和茂钱庄”的老板。老板献计说，用土方法造出的油墨也很好用，就是将松膏烧成烟油，再调上熟桐油就可以了。毛泽民于是带领红军战士上山砍松木，取松膏，试制油墨。

1932年7月7日，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新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又称“苏维埃国币”。纸币正面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字样，还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长邓子恢和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亲笔签字。

毛泽民的名字，两次印在中国金融史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出现在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作为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白手起家、励精图治，被誉为心地清白、账目清楚、廉明清正的“三清财魁”

。即便哥哥毛泽东来视察工作，或者弟弟毛泽覃来看望他，招待的也是普通的伙食标准，有时仅是一杯开水。有的同志给他提意见：“毛行长，按家庭论，毛泽东同志是你的哥哥；可在中央苏区，他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动用公家几个钱招待一下，是理所当然的。”毛泽民微笑着回答说：“

公私分明是共产党人的品德，手足之情也应该‘君子之交淡如水’嘛！”

苏区金融的“好管家”

到1932年年底，毛泽民领导下的国家银行印制、发行货币65万元，在苏区顺利流通，并肃清了货币市场的混乱。

国家银行发行第一套纸币时，在制造技术与防伪技术上都是空白，大量假币流入市场。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突发奇想，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羊毛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靠撕开或火燎纸币，通过嗅羊毛的臭味，来辨别真伪。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货币的正常流通。

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再失利，苏区财政每况愈下，纸币流通受阻，

信誉严重降低。为此，毛泽民又一次亲临前线筹集物资，还请外贸总局组织货源。回到瑞金后，他指示金库拿出现洋，按1元苏区纸币换1元现洋的比价，进行公开兑换。

告示贴出后，群众争相抢兑。两天过去了，眼看着银行库存的现洋所剩无几，大家都很担心，几次请示毛泽民是不是停止兑换。毛泽民态度坚决地说：“现在群众挟币势头正高，不能停兑！”

3天后，外贸总局从白区搞来一大批百货，各消费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布匹和食盐。国家银行又贴出告示：合作社出售的所有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群众纷纷争兑

纸币，购买急需，

一些暂时没有购物愿望的群众也来兑

换纸币。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

为了充实国家银行的家底，毛泽民想方设法地搞生产，淘金、熬盐、炼铁、造纸、

打造农具.....1932年1月中

旬，赣南铁山垅钨矿场成立，

中华苏维埃第一

个国营钨矿场正式开张，毛泽民

兼第一任总经理。

他扩大了3个矿场，把钨出口香港，1933年钨产量达1800吨，1934年产值达200多万元。

从1932年初铁山垅钨矿开工，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止，中央苏区共生产钨砂4193吨，出口总值达400多万元，增加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收入，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长征路上发行国家银行纸币

1934年9月，毛泽民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国家银行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随军长征。担任政委兼中央没收征集委员会

副主任的

毛泽民，率领警卫队伍挑着由黄金珠宝、苏区生产的银元和票子、印钞机等组成的160多担国家银行资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在长征路上毛泽民继续开展财政金融工作。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市面上只流通银元而不流通国家银行纸币的遵义。

毛泽民与时任第十五大队大队长的曹根全商量，决定趁长征以来红军从未有过的10天休整之机，发行国家银行纸币，补充红军急需物资，做好货币回笼工作，不让人民受损，特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区设立货币兑换处。

当时遵义的食盐都来自四川自流井，路远且运输困难，一直为军阀、官僚、奸商所垄断，盐价昂贵。毛泽民将没收当地军阀王家烈的大批食盐以低价卖给民众，但规定只收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

这样一来，当地民众卖出自己的物品获得纸币，再用纸币去购买珍贵而价廉的食盐，形成了一个货币流通的良性循环。

一挽新疆经济濒临崩溃的颓势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出任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周彬，与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做统战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

在新疆，毛泽民大力整顿财政金融，贷款支持农牧业、工业等生产发展，财政收入增长，市场活跃，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一挽新疆经济濒临崩溃的颓势。1963年，赛福鼎回忆说：“当时的新疆，财政经济处于民穷财尽的绝境。为了迅速扭转这一情况，毛泽民以惊人的毅力带病工作，在短短的几年中，卓有成效地整顿了新疆的财经工作。”